

思想丛林

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言论

为了一个欧洲社会运动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Pour un mouvement
social européen

Contre-feux

遏止野火

[法] 皮埃尔·布迪厄 著
河清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想丛林

Contre-feux 遏止野火

[法] 皮埃尔·布迪厄 著
河清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遏止野火/(法)布迪厄(Bourdieu, P.)著;河清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9

(思想丛林)

ISBN 978-7-5633-6658-3

I. 遏… II. ①布…②河… III.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文集 IV. F091.3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2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920mm×1 230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25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者小序

2003年,我已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两小册《遏止野火》一半多我认为最重要的篇章译出。译文收入拙著《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作为附录出版。布迪厄是西方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最重要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美国的乔姆斯基)。他的这些文论立即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拙著也被北京某机构列为“中国近十年最有影响的99本书”之一。

坦白说,布迪厄的文字非常繁复、冗长,长句套短句,有时半页才一个句号。所以翻译布迪厄非常艰辛,既要忠实原文,又要中文明白通晓,真正是惨淡经营。实际上,一位友人是南京大学法语系权威,也早有这两本小册子,一直没有动手译,恐怕就是因为布迪厄的东西太难译,吃力不讨好。

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凌云先生希望我把《遏止野火》未译的篇章译完时,我实在是苦难言,有点译怕了。最后实在是考虑到《遏止野火》的完整性,还考虑到目前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遭到质疑,布迪厄的观点愈显得有参考价值和

现实意义,我才硬着头皮应承下来,以极度的耐心,把余下的篇章译完。

对布迪厄观点的评论,都写在“按语”里。这是学严复翻译《天演论》,一边译,一边写“复按”发议论。《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中,已经作按语,因内容较多,删去一半文字,继续用于本书。对新译文,也作了十来条新按语。

这些天,法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我注意到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Royal)夫人在演说中多有布迪厄的观点,如强调社会公正,向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北欧国家学习等。

知识分子本以独立立场批判社会为己任。在今天法国,“知识分子”几乎都被体制招了安。只有布迪厄站出来,公然谴责“这个世界的主人”,揭示“全球化”乃是这些“主人”对全世界实行“合而治之”的战略口号。我亦认为,“全球化”口号的潜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以便美国主导的跨国金融资本和经济势力畅行无阻于世界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国的资源和财富。布迪厄被称为“法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可谓当之无愧。

河 清

丁亥立夏于杭州西子湖畔

目 录

上编 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言论

致读者 / 3

国家的左手和右手 / 5

索莱尔其人 / 15

外国人的命运与希波莱特测验 / 18

打着或借着理性的权力滥用 / 22

地铁司机的话 / 24

反对摧毁一种文明 / 27

“全球化”的神话与社会意义的欧洲国家 / 31

泰特梅叶思想 / 47

学者、经济科学与社会运动 / 54

为了一种新国际主义 / 62

电视、新闻和政治 / 71

再论电视 / 80

这些向我们宣称不负责任的“负责人” / 88

今天到处是不稳定 / 90

失业者运动,一个社会奇迹 / 97

负面知识分子 / 100

新自由主义,一种(正在实现的)无限剥削之乌托邦 / 103

下编 为了一个欧洲社会运动

序 / 117

为了一个欧洲社会运动 / 123

美国模式的强行及其影响 / 132

为了一种参与的知识 / 138

强者们看不见的手 / 146

反对非政治化政策 / 157

沙粒 / 170

文化处于危险中 / 172

合而治之 / 187

参考文献 / 201

译者按语 / 205

上 编

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言论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致读者

我之所以决意结集出版这些大部分未曾发表的文章,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为遏止一些像野火蔓延的危险而写下的文字,不是零碎偶兴,因而想延续其效用。尽管这些文字不像严谨著作,因情境的多样显得不统谐,但仍可以给奋力抵抗新自由主义祸患的人,提供有用的武器。^①

我对先知式的演说并无多少偏好,因此始终避开有可能受情势或共同利益挟带而超出自己能力局限的发言机会。如果我不是当时感到一种正当的愤怒,有时近乎某种义务感,我不会如此公开亮明自己的立场。

每当我可以与其他人就某一点发表共同意见时,我都试图自融于那种集体性知识分子的身份中。但这种理想常常不易实现。^②有时为了更有效,我以真名实身站出来表态,心里总存希望,如果不是引发一种行动,或一场媒体世界周期性出现的那种空然无物的辩论,至少是打破舆论一致性的表象。正是这种舆论的一致性,构成统治性言论象征力量的本质。^{〔附1〕}

注释:

- ① 这些讲话是在不同的场合而作,语气和风格不连贯。哪怕会增加这种不连贯,我还是将这些讲话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使历史背景感更强。我也零散加了一些起码的提示,以便读者延伸有关论证。
- ② 我作过许多集体性谈话,尤其与“思考高等教育研究协会”(ARESER)、“支持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国际委员会”(CISIA)、“国际作家协会”(我已拒绝自认是其成员)一起合作。所有这些集体性谈话,我只选取了一篇,即刊登于《解放报》的那篇题为“外国人的命运与希波莱特测验”的文章,征得共同作者们的同意。其中,阿罗(J-P.Alaux)署了名,而达杜奇(C.Daadouch)、莱维(M-A.Lévy)和洛查克(D.Lochak)没署名。他们没署名是因为那些所谓自由报纸论坛的负责记者司空见惯的阻止。他们始终寻求与某些名字相连的象征性资本,不愿意文章署一个缩写,或署好几个名字。这正是形成集体性知识分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他们总是让那些不那么知名的名字消失,有时通过商量,有时像这里这样不作征询。

国家的左手和右手^①

问：最近一期你主编的杂志是以痛苦为主题。^②人们读到好几篇访谈，是采访一些传媒不给予说话机会的人，如贫困市郊的青年、小农户主、社会工作者。一位处境困难的初中校长，表达了他个人的苦楚：他不是在负责传授知识，而是身不由己地成了类似派出所的警察。你认为这样个人性和故事性的证词可以使人悟到一种集体性的困病？

布迪厄：在进行关于社会痛苦的调查中，我们遇到很多像这位初中校长那样的人。他们以个人悲剧的形式，承受着社会领域的矛盾。我可以列举一位法国北方一小城的“困难市郊”负责协调各种社会行动的计划负责人，他所经受的矛盾已达到了极限。所有人们称为“社会工作者”的人，如社会保障工作者、教育者、基层法官，还有越来越应该算上中小学老师，今天都遭受着这样的困顿。他们，即那些所谓“花钱的政府诸部”的所属人员，构成了我所说的国家的左手，政府内部是过去社会

斗争给国家留下的遗产。与他们相对的是国家的右手,是财政部、国有或私立银行和各部委办公厅的“埃纳克”们(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众多我们参与(和将要参与)的社会运动,表达了国家小贵族阶层对国家大贵族阶层的反抗。

问:你怎样解释这种愤怒,这些形式的绝望和反抗?

布迪厄:我以为国家的左手觉得国家的右手不再了解或不再愿意真的了解国家的左手在干什么。不管怎么说,右手不愿意付出代价。所有这些人绝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退出或正在退出一些曾经属于它负责的社会生活领域^[按2]:公共住房、公共电视广播、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对于其中一些人,这种行为尤其令人惊诧或气愤,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党主政的国家,人们至少可以期待它充当公共服务的保障,无分别地向所有人开放提供服务。人们所描述的政治危机,即一种反议会主义,实际上是对负责公共利益的国家的一种绝望。

如果说社会党人不像他们自称的那样“社会主义”,这不会让人抱怨;毕竟时世艰难,活动余地不大。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竟然促成如此程度的缩减公共事物:首先在事实上,采取各种措施或政策(我仅举媒体),以清算福利国家的成果,又在公共言论中赞扬私营企业(仿佛创业精神只有来自企业而别无

他途),鼓励私人利益。所有这些,包含有某种令人惊讶的东西,尤其对于那些被派到第一线完成“社会”职能的人。他们在填补市场逻辑造成的最不能容忍的缺陷,却没有真正完成使命的手段。他们怎么会不感到自己备受欺骗或遗弃?

人们早就应该明白,他们的反抗远远超出了工资问题,尽管工资是给一项工作和相关工作者价值的明确标志。一项工作被人瞧不起,首先表现在该工作的报酬少得可怜。

问:你相信那些政治领导人的活动余地是那么有限吗?

布迪厄:当然,这种余地比他们让人相信的要大得多。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个当政者拥有一切自由的领域:象征的领域。任何国家公职人员都应该以身作则,尤其我们声称有一个尽心于最贫困者利益的传统。然而,当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腐败的榜样(有时几乎是官方惯例,比如某些高级公务员的奖金),还有背叛公共服务(可能言重了,我是指拖沓懈怠),以及各种形式的将公共财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转用于私利——任人唯亲、偏袒徇情(我们的领导人有许多“个人朋友”)、拉帮结派——人们怎么会不产生怀疑?

我还没说象征的好处!无疑,电视跟贿赂同样导致国民德行的堕落。电视把那些“你见过我吗”之辈,推到政治和知识界

的前台。这些人一心只想抛头露面,自吹自擂,与默默为集体利益尽力的价值准则格格不入,而这些准则本是对公职人员或党派活动家的基本要求。这种自我吹捧(常常贬损对手)的利己主义心思,也可以解释追求“广告效应”为什么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对于许多部长,一项措施的价值,似乎只在于其是否有广告效应,是否一经宣布就可看作已经实现。总之,大的腐败案曝光出来令人愤怒,因为它揭示了在声称的德行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强烈反差。但这只是小者中的大者,还有无数日常小“过错”,奢华的炫耀,对物质或象征特权的趋之若鹜。

问:面对你发现的情势,你看国民的反应怎样?

布迪厄:我最近读到一位德国作者写古埃及的一篇文章。他指出,在一个对国家和公共事业发生信仰危机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两样事物的繁荣:在领导阶层是腐败盛行,原因是对公共事物尊敬的衰落;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对现世救助的绝望而皈依宗教。^[按3]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国民既觉得被排斥在国家之外(事实上,国家对国民除了要求必须的物质贡纳之外别无他求,尤其不要求忠诚和热情),便拒斥国家,把国家看做一种外在的、只为自己谋利的强权。

问：你谈了主政者在象征领域的宽广余地。这不仅涉及以身作则的行为，还涉及鼓动性的言论和理想。对这一点，目前不足的原因何在？

布迪厄：人们谈论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沉默。令我吃惊的，是政界人士的沉默。他们惊人地缺乏鼓动人的理想。无疑，政治的职业化，以及党派从政者的必须条件，越来越排斥直露敢言的人格。另外的原因是，一批(政治科学)学院毕业生进入政界，改变了政治活动的定义。他们懂得为了装正经或不显得迂腐过时，还是谈管理比谈自我管理为妙，无论如何，要给自己扮出经济理性的表象(语言)。

囿于狭隘经济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观的短视(也畅行于南北关系之中)，这些经济问题的半桶水行家显然没有关注到当今道德和物质贫困的短期尤其是长期的真实代价。这种贫困是经济界名正言顺的“现实政策”唯一肯定的结果：违法，犯罪，酗酒，公路车祸，等等。这里依然是，一心关注财政平衡问题的右手，无视左手在干什么：它要面对“预算经济”常常代价高昂的社会后果。

问：曾是国家行为和国家功用基础的价值是否不再令人信服？

布迪厄：首先出来践踏国家功用的人，常常是同一些捍卫者。（社会党的）雷恩大会和赦免法令，比十年反社会主义运动更让社会党失去信誉。一个“变卦”的党徒要比十个对手造成的损害更大。社会党主政十年，招致了对国家信仰的沦丧和70年代开始以自由主义之名对福利国家的摧毁。我尤其想到了住房政策。当时这项政策的明确目的，是把小市民从集体住宅（也从“集体主义”）中抽离出来，附归于单家小楼或公寓套房的私有财产。在某种意义上，这项政策可谓太成功了。其结局正说明了我刚才所说的某些经济政策的社会代价，因为这无疑是空间隔离及由此造成所谓“市郊”问题的主要原因。

问：如果人们想确定一个理想的话，可能是回归国家、回归公共事物的感觉。你跟大家观点不一样。

布迪厄：大家的观点，是谁的观点？是那些在报纸上写文章的人，那些宣扬“最小限度国家”、“匆匆葬送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相当普遍的信仰，把一些完全可以讨论的问题，一开始就置于讨论之外。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些“新知识分子”集体造势，造成一种要求国家退缩，更宽泛意义上是要求服从经济价值的氛围^[按2]，值得分析。我想到了所谓“回归个人主义”，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旨在摧毁福利国家的哲学基